

含混杂沓：1940 年代香港文学的 殖民话语表达

Ambiguousness and Disorderliness: The Colonial Discourse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1940s

张望¹

Wang ZHANG

中国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20210018@cqnu.edu.cn

摘 要 1940 年代香港文人的殖民话语表达极为含混，可从文学作品的“日常生活”描摹、“异国人”形象建构以及“香港人”形象塑造三个方面体现。对西化侵蚀的批判与对杂糅本色的揭示呈现出 1940 年代香港文人对英国殖民统治暧昧含混的心态。他们在抗战初期、日占时期以及战后对异国人形象的不同建构，则显示出他们在文化认同、殖民批判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看法，以及对殖民批判不同的指向，呈现出因势而动的复杂性；而他们对“香港人”形象的不同塑造，则反映出 1940 年代香港文人复杂多样的殖民体验，同时也折射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分裂。

关键词 香港文学；1940 年代；殖民话语；文化认同；身份认同

Abstract In the 1940s, the colonial discourse expressed by Hong Kong literati was extremely ambiguous, 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f their literary works: the description of “dail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er,” and the shaping of “Hongkonger Identities.” Criticism of Westernisation and the revelation of a hybrid essence reveal the ambivalence of Hong Kong literati towards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1940s.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the images of foreigner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post-war era, expressed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opin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 colonial criticism and other issues, and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colonial criticism, show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situation. Moreover, their different portrayals of “Hongkongers” reflected the complex and varied colonial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literati in the 1940s, while also mirroring fragmented split identity.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The 1940s; Colonial Discourse; Cultural Identity; Identity

1940 年代的香港文学应对着复杂多变的殖民生态，它在“英国统治”“对日抗战”以及

收稿日期：2023-11-13

作者简介：¹ 张望，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项目基金：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香港文学的殖民话语与抵抗书写（1937-1949）研究”（编号：2021BS02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香港文化空间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研究”（编号：23SKGH096）阶段性成果。

“日本侵占”“战后英殖民卷土重来”等一系列社会情势与话语变迁中被生产、被塑形，同时，香港文学的创作主体又因不同的身份背景、政治立场与文化取向而呈现出殖民话语的差异。他们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日本殖民统治以及本土身份等话题的观瞻，同时也影响着文学对殖民体验、身份认知以及文化认同的表达与呈现。既往学界对1940年代香港文学的关注，多注重对大陆南来文人的关注和呈现，且集中展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抗战”，旨在表现香港与内地抗战的深刻联系，却鲜少关注该时段除南来作家之外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对这些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殖民话语和本土意识则更是鲜少讨论。¹这一关注上的偏重，往往之于香港作家对英、日殖民的暧昧态度与多元取向有简单化、本质化之嫌，同时也忽视了香港本土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建构理路，总体上遮蔽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复杂生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审这一时期香港本土作家、南来作家甚至西方作家的文学文本，在对比中复现、反思殖民话语的含混与深意。

一、日常生活：西化的侵蚀与杂糅的本色

1940年代香港文人的殖民体验与话语表达首先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描摹，特别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对外式生活的观察立场、态度眼光与呈现方式。我们以黄药眠的《淡紫色之夜》与黄天石的《一曲秋心》两部小说为例，来具体说明这种差异。两部小说均写香港舞女的故事与遭遇，但在对香港城市景观的描摹以及对舞女日常生活的呈现上，都显示出不同的叙述手法与表现方式。

首先，在呈现香港城市景观时，不同作家显现出不同的侧重。在《淡紫色之夜》的开头，黄药眠用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句子展开叙述，他写道：“这是在南方的一个小岛上，一般人都认为它是被战争和灾难所忘记了的幸福之城。所有一切幸福的人一跑到这里，都更加幸福了，生活好像要在幸福的软床上跳起舞来。”²以这样的开场引出一个舞女的悲剧故事，可谓极具张力。接下来在一段美好的自然风光描写之后，黄药眠笔锋一转，便对香港的都市场景展开叙述，他写道：“看着那都市里面黄昏中泛起来的红雾，和最先吐出来的红宝石似的霓虹灯，自然也就更加沉醉了，他们脑子里所考虑的是：今天要到那一家酒店里晚餐和到那一家舞厅里跳舞。……这里有着最多的东方的美女。”³从小说的开头看来，黄药眠用了大量的笔调渲染香港

¹ 既往对1940年代香港文学生态的阐释几乎都围绕大陆南来文人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和文艺创作展开。参看几部较具代表性的香港文学史，基本是在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叙述基础之上有所延续和增删，主要会论述到的内容包括“鲁迅的纪念活动”“《文艺阵地》《大公报·文艺》《立报》等刊物的创办”“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戴望舒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文协香港分会等文艺组织的文艺活动”等，鲜少对1940年代香港本土作家的具体作品做分析和阐释。主要对香港文学的具体作品进行解读的研究有赵稀方的《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以及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论中国现代作家的香港书写（193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赵著的讨论有关注意到香港小说作品中的殖民话语，但更多是从整体上进行观照，却没有对1940年代文学中更为复杂的话语风貌做呈现，侯著虽重点关注到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然而却重点关注南来文人，特别是左翼南来文人的创作，对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却鲜少讨论。

²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03页。

³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第104页。

的自然环境与都市环境,仿佛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在对香港的一切进行打量,虽然在叙述中运用了颇多诸如“碧绿的海水”“清尘般的细雨”“圆圆的天穹”“玫瑰色的红霞”等美好的字眼,但却是刻意与之后舞女的悲剧遭遇形成对比。小说开头经过了缓缓的铺陈,直到“这里有着最多的东方的美女”,方才引出对舞女的描摹,这既代表着叙述者对香港城市景观的凝视,也侧面反映出作家黄药眠对香港城市景观的审视,而“东方的美女”中“东方”一词则又证明了叙述者在审视香港时所持有的“东西文化对比”的眼光,也预示着小说在进入后半段的时候,作者会持续通过叙述者视角呈现自身的文化考量,从而对香港的人、事、物做出殖民层面的读解。果然,在后文一处对香港酒吧环境的描摹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作家这一文化视角的显现。他写道:“酒吧间,许多的中国的外国的男男女女,出出进进,无线电收音机里广播着从美国,从马尼拉,从印度传来的音乐,……他腾起眼睛茫然回顾,然而这又是失望,那说话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她正挂在一个外国伴侣的臂上,……”¹作家对于中外男女的强调,对于不同国家音乐的排列,以及对于舞女正挂在一个“外国伴侣”的臂上的刻意凸显,都表明作为南来文人的他们对香港“混杂”的文化生态以及“西化”的城市景观的敏感,而这种对“混杂”与“西化”的敏感,使得作家在叙述香港时自然地将香港排斥于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行列。

不同于黄药眠在小说开头对香港城市形象的铺陈,黄天石的小说《一曲秋心》开端则显得尤为直接。他在小说开头直接写道:“大华舞厅内内外外的花店花篮堆得满满的,这是星期六的晚上,据说梁赛珍梁赛珠姊妹到港伴舞的全场舞女都打扮得艳丽夺目;宝气珠光,衣香鬓影,舞客们却沉浸在香雾里,给迷人的红绿灯光和抖颤的夏威夷音乐陶醉了。”²虽然在黄天石的描摹中还是有提及几处香港的都市景观,但在叙述中既没有巧妙地设计与后文所述故事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没有产生任何想要强调某一场景的企图,仅仅只是以客观的眼光在短短几句中白描了舞厅的场景,从而自然地引出故事的主人公张雪艳。事实上,整个作品都鲜少对香港城市景观的书写,这证明作为香港本土的叙述者并不会对香港这种充满西方现代性意味的景观产生过多的陌生感,因此便不会特意地去对这一景观进行凝视与殖民文化解读。

其次,在呈现香港舞女的日常生活时,不同作家也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在黄药眠的小说叙述中,他用了非常大段的文字颇为细致地呈现了作为舞女被豢养、被包装的生活日常:

早上起来随便念点 ABCD,早餐后学学打桥牌,此外就什么事也不大十分做了。下午她们的义母开始教她们怎样挤眉弄眼,教她们拉长着嘴唇皮作着不露齿的微笑,教她们走路时候,要怎样扭弄腰肢,教她们怎样按照着牌子在光滑的地板上踏着狐步。她们每天早上吃着牛油果和面包,如果样子生得好看,还要受到义母们的特别优待,加上干酪、牛奶,因为吃得好好,天天没有事做,……

¹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第127页。

² 黄天石:《一曲秋心》,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第212页。

于是，她们开始以贵妇人的姿态出现在美丽的时装店里，带着满身巴黎香水的气味走进花室，走进夜总会，走进咖啡馆，走进充满着香烟和酒味，粉气和油脂的舞场，灯光一时变成淡青，一时变成淡红，每隔十几分钟就变过一种情调。她喝着法国的葡萄酒，吃着澳洲的火腿，美国的鲜橙，穿着兰开夏织的羊毛的内衣，披着日本制的轻荡的罗衫，两个乳峰的窝处，挂着黄金的胸口针，耳边和指上闪着深蓝的假宝石。¹

叙述者在叙述中刻意凸显的香港舞女生活的“混杂性”，那些西式的食物以及标明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活物品拼凑出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场景。这种营构一方面渲染了西方文化对于香港文化空间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将这种西化影响与后面舞女在香港遭到两个西班牙人侵犯、迫害致死的悲惨遭遇建立关联，从而作出一种有意味的对比。就这样，被西方元素不断包裹的香港，最终走向的是被西方侵犯、杀害的悲剧结局，表达出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的民族性戕害。

在黄天石的小说中，对舞女日常衣食住行的描摹则没有如此细致，她们出入西式场所，过着西式生活，但在叙述者的眼里，西式的风物与文化早已内化为香港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洋杂处、中西交融就是香港文化的本色，因此并没有陌生化、反讽书写的必要。

不仅如此，在黄天石笔下，这些舞女甚至还焕发出一种中西夹杂的美感，这源于作家的细致笔触。比如，《一曲秋心》中舞女张雪艳的出场描写，便有此韵味。黄天石写道：“她的装饰比平时更朴素，身穿一件浅灰色薄绒长旗袍，襟上插一朵白色康乃馨，足登素缎银花平底鞋，衬着浅色丝袜；脸上脂粉不施，娥眉淡扫，薄薄涂了一些口红，在千红万紫中间，像一朵空谷自开的白梅花，全场视线，不由得不被这朵白梅花所吸引了。”²我们可以看到，黄天石在此处的笔致非常特别，在舞女张雪艳的身上既有西式元素的点缀，又蕴含着如白梅花般中式的素雅之美，可以说他将香港文化空间所孕育的这种中西混杂的女性形象描摹得非常到位，入木三分。

再次，同样是叙述香港舞女的悲剧故事，在黄药眠和黄天石的笔下，作为故事背景的香港却在故事中承担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在黄药眠笔下，《淡紫色之夜》中的舞女露丝有一个情人名为布尔，布尔许诺她会凑钱替她赎身，然后两个人共度余生。然而，就在布尔返回内地的时候，露丝已遭到了几个西班牙客人的玩弄与杀害。黄天石小说《一曲秋心》中的舞女张雪艳也有一个情人，名为秦季子，他们相识于三十年代末的香港，本来才子佳人、一往情深，却因为各种人事变故、战火不断，使得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寥落平生。就是这样两段关于舞女与情人的爱情悲剧，两位作家的书写时却有很大的差别。在黄药眠的笔下，香港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场景与环境，同时它还是造成舞女露丝命运悲剧的唯一要素。而在黄天石的笔下，

¹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第105-106页。

² 黄天石：《一曲秋心》，第212页。

香港却仅是作为整个故事的发生地和故事背景而呈现的,男女主人公带有明显的中西混杂的人物特性,这由香港的社会环境所形塑,但是却并不是影响他们性格心理以及人生际遇的唯一要素。如果说黄天石笔下的张雪艳在面对香港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历史变迁时还尚能展现人物自身的挣扎、犹疑与无可奈何的话,黄药眠笔下的舞女露丝则完全是被动地被抛入香港的黑暗社会之中的。她被香港西式的生活方式所豢养,同时又遭到香港社会中西方男性的欺凌,而同样受到香港社会侵染的义母与姊妹,在她遭遇不幸时也并不能给予她安慰与帮助,相反却是另一种将她推向绝境的力量,使得她最终在西方客人的手中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在黄药眠的笔下,香港社会已然被西方殖民力量所操控,它是一个黑暗的、无爱的、冷漠的世界,正侵蚀着这个从中国大陆沦落香港的女孩,瓦解着她的精神意志,摧残着她的肉体灵魂。可见,露丝的人生悲剧完全来自于香港社会的这种殖民性压迫,这便是他在书写这个发生于香港的悲剧故事时鲜明的反殖民视角。

二、异国人形象:殖民批判的不同指向

1940年代作家笔下关于香港的小说,都写到一些在香港的异国人形象,他们在塑造这些异国人形象时因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认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比如,一些文人处于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对香港的异国人形象书写必然带有反殖民的眼光,常常表达出对于殖民关系的批判。比如在黄药眠的《淡紫色之夜》中,他便描写了几个恶劣的西班牙人,他们横行霸道,欺凌舞女,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了露丝。他以舞女露丝的视角呈现其中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貌是“满面都是胡须,乌黑得可怕,可是从头顶上松了起来的稀疏的头发却露出裹里面的黄白的肉色,两个肩头向上翘起更显示出他的卑鄙”¹,另一个则“颈巨大得像一条肉柱,一条银色的领带很松的像条蜥蜴挂在胸前”²,刻画出异域男人的残暴与可怖。当这些西班牙人在对露丝施暴时,她是绝望的、无力的,“她一时看见那一双毛茸茸的手,裂开来的肥厚的嘴唇,那一条蛇一样的红色的领带,她一时又看见那满面胡子的黑色的脸孔,那阴毒的眼睛,那锯齿般的牙齿……”³这些丑化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描写,暴露出西方殖民的丑陋面孔,非常明显地显现出南来文人的批判论调,显示出与西方殖民对立的立场。

又如,一些本土文人对异国人形象的建构比较复杂。他们长期浸润于香港中西交杂的文化氛围,决定了“从他们诞生的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于一个‘分裂的感知’和‘双重的视界’之中”⁴,在此之下创作出来的异国人形象也注定不会是单一的丑化或片面的消极。香港本土作家芸女士在小说《无名氏的女婴》中塑造的一位美国女医生便极具代表性。

小说《无名氏女婴》通过主人公“我”的视角,对香港一家产科医院的日常进行了白描

¹ 黄药眠:《淡紫色之夜》,第115页。

² 同上注。

³ 同上注,第118页。

⁴ 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速写，更将主要的着墨点放在这家产科医院的美国女院长“西医生”身上。小说中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及女院长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四十余岁的老处女，美国人，新教徒”¹，大家都称之为“西医生”。小说在一开场便将焦点集中在医生作为西方人的身份背景之上，并以此视角展开叙述。“她有一副迎人的笑脸和耸听的口吻。使得初和她接触的人，都非常的感服，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人。我最初就是给错觉懵蔽了，以后才渐次改正过来。”²这样便点明了西医生文明的外表下包裹着虚伪的一面。小说中写到香港近乡的农民，因妻子难产，住进了这家产科医院，待妻子顺利产婴后呆了六天，正准备出院时，哪知婴儿却出了毛病，于是西医生不放心，就嘱咐他们多留几天。但是农民有四个孩子，全靠他一人劳作过活，女人和小婴儿不出院，他既要烧饭又要看管小孩，就没有办法出去做工维持全家生活，于是他恳求西医生让他们带着婴儿回家。但是，西医生却拒绝道：“我不管这许多，你这些野蛮不懂道理的人！要回去，你带她回去罢，可是婴儿现在有病，须留在这里。……接生费交清了没有？”³农民一时间怒不可遏，便撇下了刚出生的女婴，兀自带着妻子离开了医院，从此以后医院便多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并被西医生命名为“无名氏之苏女”。这是一个难以评价是非对错的故事，对于西医生而言，作为一个产科医生，她本着为婴儿和孕妇的卫生、健康负责的原则，坚持让她们留院治疗，本是极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行为，也符合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价值，她的做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换个角度，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她又似乎忽视了香港郊乡农民真实的生存困境，她没有推己及人地感受到农民的难处。对于农民来说，他确实有自己的生存困难，但是他最后残忍地遗弃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也可以看出他在观念和思想上的陈腐与野蛮。除了农民的故事，主人公“我”还回忆了自己与西医生之间的一些事情。“我”在和丈夫初入医院生产时，由于穿着比较陈旧，便被西医生嫌弃家境不好，当他们询问医院双人房的情况时，西医生立马说明双人房的收费与规矩，并认为与他们不甚相配，于是建议他们选多人房。而且“我”还发现西医生区别对待不同病房的病人，对于住高级病房的有钱人，西医生便“一呼百应，无微不至”，而对住普通病房的人，西医生则“严肃得怪可怕”。通过对几件小事的速写，一个西方女医生的独特形象便跃然纸上。

作者以小说中“我”——一个香港知识阶层华人女士的视角展开，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本土港人在看待西方人以及西方文化时的复杂眼光与心态。一方面，“我”作为一个选择到西式产科医院待产的孕妇，在生育小孩以及孩子的健康问题上，“我”是和西医生享有共同的理念与价值的，即珍视生命、尊重科学。故事中也提到“我”的小孩生下来也面临着生病的问题，后经西医生的诊治渐渐脱离危险，所以，从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西医生对这些孩子们的

¹ 芸女士：《无名氏的女婴》，载谢晓虹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465页。

² 芸女士：《无名氏的女婴》，第465页。

³ 同上注，第467页。

诊治,不让农民刚刚出生的生病的孩子出院等行为,确实是在践行一个医生对生命以及科学的尊重,这是“我”所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香港的华人,西医生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人,“我”又看到了她身上虚伪、嫌贫爱富、唯利是图的另一面。正如农民在面对西医生野蛮的指责时怒喊道“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¹,西医生在看待香港的华人,特别是香港的穷苦华人时,确实带着种族歧视的眼光,那脱口而出的“野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当时香港华人群体中的一些陋习和陈腐观念,但是要说里面也包含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也不为过,他们不会意识到中国的这种贫穷的现实有很大程度来源于西方的殖民侵蚀。通过芸女士笔下这个西方女医生的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香港本土文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态度与暧昧立场。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滋养,进而对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念表示认同;另一方面,抗战的全面爆发也让本土文人开始注意到这种西方文化中所潜藏的殖民性与虚伪性,进而开始在文学表达中展现出对西方殖民的主动反思与批判。

然而,像这样对西方殖民主动展开反思与批判的小说并没有发展成为香港文学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日本对香港的攻陷,香港本土作家笔下的异国人形象又发生了变化。我们以香港本土作家侣伦的小说《无尽的爱》为中心来看看异国人形象在日占时期产生的流变。

《无尽的爱》以中国主人公戴克的视角展开,以日占时期的香港为故事背景,讲述了葡萄牙姑娘亚丽安娜的经历。亚丽安娜的未婚夫——西班牙小伙儿巴罗是义勇军的机关枪手,但是却不幸被日军俘虏。为了营救未婚夫,亚丽安娜结识了戴克,并托戴克在日军宪兵部做特殊工作的朋友黄君帮忙打探情况,谁知刚刚有了巴罗的消息,亚丽安娜就被日军抓了起来。在被俘虏期间,巴罗想尽办法越狱,谁知被日军抓住当场击毙。悲愤中的亚丽安娜决心为未婚夫报仇,于是设计毒杀了日军军官,随后事迹败露,也遭到杀害。在这个故事中,作者笔下的西方人形象不似南来文人笔下的残暴无情,也并没有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英雄,正义而勇敢。很明显,在日占香港的背景下,本土作家已将殖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日本,而西方的殖民者却摇身一变成为与香港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合并为了一个作为整体的香港人形象,共同抵抗日本的殖民侵略。除此之外,在小说中,侣伦还极尽笔墨描绘日本军人的残暴,他写道:“野蛮的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杆站在两边,并不因为义勇军放下武器而宽恕他们。当他们举起了两只手走近的时候,日本兵就举起刺刀猛刺过去,死的伤的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地上。”²亚丽安娜的母亲和弟妹也都是在睡梦中被日本飞机投放的炸弹直接炸死的,可见日本人在香港杀戮手段之残暴。除了描写日军暴行,他还描绘日本在香港进行的殖民改造,他写道:“弥敦道一带的店铺几乎完全是投机商人改设的日本风味的咖啡店,雇用了许多白俄和中立国女性作为女侍:到处飘溢着柔和的音乐声。在一间用白布写着‘松田御

¹ 同上注,第469页。

² 侣伦:《无尽的爱》,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第379页。

料理’五个字的店门外面，我为一支平日最欢喜的小夜曲所吸引，不自觉地停下步子。透过那排列了西饼面包的玻璃橱窗，我见到一个熟识的身形的背影，在桌子行列之间迂回地闪动着。”¹可见，日本在占领香港之时便开始以日本的文化要素包裹香港，意图洗去它身上的西化痕迹。

通过对几部作品中异国人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940 年代文人的香港创作在批判殖民时的指向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文人在对日抗战激起了充足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既反对日本的殖民，也反对西方的殖民，因此，通过对在港西方人残暴形象的建构，表达其对殖民统治的控诉。除此之外，一些本土作家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笔下的西方人有颇为先进的一面，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价值，另一方面，伴随着南来文人在香港的抗战书写，本土文人也开始对西方人虚伪残酷、殖民侵略的另一面加以反思，因此建构出颇为复杂的西方人形象。然而，随着日本对香港的侵占，日本骤然间取代了英国的位置成为了香港反殖民的首要指向，因此，在本土文人的笔下，曾经殖民或侵略香港的西方人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抵抗日本殖民统治，反对日本残酷侵略的“共同体”，因此，这一时段香港本土文人的小说中便多是残暴的日本人形象以及英勇正义的西方人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本土作家在殖民批判上的内部转向。

三、香港人形象：殖民生态下的自我审视

除了对香港的日常生活描述以及对异国人形象的建构两方面存在差异，在对香港人形象的建构中，南来文人与本土文人也存在着差异。有后殖民理论家认为殖民地作家会在宗主国文化与自己的本土文化间徘徊，有时甚至会感到被迫边缘化，这时他们会依据自己经验的那些东西（依具体情况可指自己对环境的切身体验、迁移、入侵等等），找到自己的地位，进行自我再造。²事实上，身处被殖民化统治的香港，文人也会在面对西方殖民文化和本土中国文化的同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体验来确立一种自我，从而建构出自己所认为的香港人形象，而这些建构的香港人形象也因作家不同的殖民体验、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而存在着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香港人形象的不同侧面。

首先，在一些作家笔下，所谓“香港人”就是一部分穷凶极恶、虚伪分裂的“中国人”。舒巷城在小说《朱先生》中描写了一个在行为与精神上都极为分裂、虚伪的香港教员形象。朱先生对中国的古文很是敬爱，也颇有研究，但却决不穿长衫，相反喜欢穿洋服。他颇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号召街坊为难民捐款，但他又并不与人平等，也并不尊重他人，而是以颇为陈腐的道德观念来维护自己的脆弱的自尊。他还声称自己是“圣人之徒”，于是在孔子诞辰那天，他便搞了一个“庆祝孔圣诞”的活动，但实际上却是叫学生为他“献金”来庆祝。³总

¹ 同上注，第 389 页。

² [英]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 133 页。

³ 舒巷城：《朱先生》，载谢晓虹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一》，第 502 页。

之,舒巷城通过简短的篇幅便勾勒了这样一个虚伪、分裂的香港教员形象。陈残云在小说《还乡记》中以一个从东南亚返乡的广东人的视角展开了对香港人的描摹。在小说中,他写到香港码头的检察员“冷得可怕的脸孔”,写到百货公司的职员“势力而鄙视”的眼睛,还写到女人家“忸忸怩怩”装样子的神情。¹在途径香港的短暂停留间,他们被香港的船员“敲竹杠”,被香港的小偷“割衣袋”,被送船的工人“高声斥责”,还差点被邋遢的江湖骗子骗钱。²这些经历和遭遇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次发出“亡国奴”的哀叹与怒骂,可见,陈残云以外来人的视角批判着这些穷凶极恶的香港人。然而,虽然两个作家都讽刺批判了这些他们笔下的香港人,但他们仍在小说中表达出对他们仍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如舒巷城笔下的朱先生也会在公开演讲时发表“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为国家,为民族”³努力奋斗的宣言,《还乡记》中的主人公也会在途径港岛的时候“擦擦眼泪,仰头遥望”山顶的城市,然后感叹“香港从前也是中国的土地”⁴。可见,作家们一方面基于对西方殖民的批判立场,将笔下的香港人形象塑造得穷凶极恶、虚伪分裂,从而论证西方殖民对香港人的负面影响与深刻毒害;另一方面,又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时时不忘香港是被西方殖民者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从而在塑造这些香港人形象时也让他们在身份上认同上归属于中国人。

其次,在另外一些作家眼里,所谓的“香港人”就是面目模糊的“西方人”,这主要集中在部分香港本土作家的笔下。这部分香港本土作家由于自小就生长于被英国殖民的香港,所以他们自小便接触到香港中西交杂的文化氛围,同时也接触到大量的西方人,在作家自己的身上也烙印下非常多中西混杂的印记。因此,他们可以说就是香港人本身,“身处此山中”的他们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便不会产生如南来作家或者外来作家那般深刻的外来感受,或拥有特殊的发现。事实上,像侣伦这样的本土作家,他作品中的香港人形象实际上是和西方人没有太大的区分度的。在《无尽的爱》中戴克的人物形象就很有代表性。在小说中,戴克是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的职员,而女主人公亚丽安娜是一位葡萄牙姑娘,当两人在九龙城摆地摊卖书第一次遇见时便对答如流,⁵小说并未特别提及两人是采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推测应该是英文交谈,但正是侣伦这种理所应当以中文书写外国人经验的方式,可以看出在他的认知里并没有特别分明的香港人与西方人的界限,也没有特别分明的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区别,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决定了他笔下的香港人形象并不会在自觉的对比中而呈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往往就和他们笔下的西方人相类似。这种自然而然地以中文书写外国人经验的写法还同样地出现在黄碧云的《温柔与爆裂》以及舒巷城的《巴黎两岸》等作品之中,这似乎反映出本土作家对于香港以及香港人的一种共同性的认知。事实上,我们仔细参看他们笔下的这些香港人形象确实也与他们笔下

¹ 陈残云:《还乡记》,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第168-169页。

² 同上注,第170-171页。

³ 舒巷城:《朱先生》,第500页。

⁴ 陈残云:《还乡记》,第165页。

⁵ 侣伦:《无尽的爱》,第367-369页。

的西方人形象所差无几。侣伦笔下的戴克如果不在小说中交代他是香港电影公司的职员，我们也很难看出他作为香港人区别于作为西方女孩的亚丽安娜的地方，他们在沙丽文咖啡座里都喝着咖啡，抽着“海军牌”的香烟，亚丽安娜对戴克表示不知道他是否喜欢咖啡，戴克答曰“什么我都喜欢”。他们共食一块布丁，他们对那些西洋的书籍如数家珍，甚至还有共同仇恨的敌人日本人，所以，如果小说不加以说明，我们甚至很难分辨出戴克是一个香港人。同样，《西班牙小姐》《福田大佐的幸遇》中的香港人形象也同侣伦笔下的西方人具有相似性。可见，香港一些本土作家已然非常和谐地“融入”了香港的殖民文化，没有特别强烈的殖民性感受，也便不会在香港人与西方人之间划分出特别的界限。

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将“香港人”塑造为中西交杂的“假洋鬼子”。罗拔高在小说《山城雨景》中便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形象——邬先生。罗拔高原名卢梦殊，1920、1930年代在上海是文化活动家，在电影界、戏剧界编辑刊物，也写通俗小说，1937年左右到达广州，投稿过香港《工商日报》，1941年4月已身在香港，¹香港日陷时期，他为香港《华侨日报》工作，担任采访主任，1942年还曾代表香港报界到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新闻工作会议”²。正是这样一位南来香港且有亲日嫌疑的作家，他笔下的香港人形象邬先生便充满意味。《山城雨景》中的邬先生是一名香港的士绅，小说讲述了他任在殖民地腐朽的生活以及他在日占香港时期的没落。小说开头便指出邬先生便是“真正香港人的典型”，作者写道：“百年好景的香港，除了一次大罢工给他尝过东亚人的味儿之外一向都是逸乐的，豫暇的而且色情的；它的天气永远那么地常春，人们就为了这常春的引诱与迷惑便跟着逸乐的，豫暇而色情起来，形成一个真正香港人的典型了。这才是真正的香港人呢，如像邬先生那么的。”³在作者笔下，邬先生是中西交杂的假洋鬼子，他“年青的时候曾读过好几年书，更到英国去进过大学”，“英文的根柢是很了不得的，但中文可早已全忘记了”⁴，他穿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大衣，用父辈积攒下来的财产为自己捐了一个“爵士”的头衔，住在“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里，既有钱又有势，充满了“真正香港人的气焰”⁵。他还是“个人的享乐主义者”，生活极尽淫乱奢靡，每天的事项就是吃饭、看报、“打扮成一个典型英国绅士般的高等华人”去香港大酒店喝下午茶，去石塘咀的俱乐部玩桥牌、会女友。同时，他还是一个在日治时代下流落街头的没落鬼，日本对香港的攻陷使得他失去了英国殖民时代的一切，他的多位情人、清客、账房、堂差、花王、厨子、汽车夫等等全部跑了；他位于山上的绅爵豪宅也再也无法入住，他只得流落街头，在“风雨萧萧下面面奔走着他那短促的前程”⁶。通过对英国殖民时期邬先生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以及日占香港时期邬先生流

¹ 卢玮銮、郑树森、熊志琴：《沦陷时期香港文学及资料三人谈》，载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熊志琴编校《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1页。

² 黄念欣：《香港文学大系小说卷二·导言》，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第47页。

³ 罗拔高：《山城雨景》，载黄念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第80页。

⁴ 同上注，第83页。

⁵ 同上注，第80-81页。

⁶ 同上注，第96页。

落街头的落魄生活进行对比,小说充满了对英殖民的批判。作为“真正香港人的典型”的郭先生随着时移势易,人财两空、流落街头,表达出英国的殖民统治毫无出路、毫无前景的现实隐喻。因此,我们看到站在批判英国殖民、迎合日本殖民的立场,作家所呈现的香港人形象便是一个被英国文化所腐蚀的假洋鬼子士绅形象。

四、结 语

1940年代香港的殖民生态极为复杂。后殖民理论曾指出殖民话语内部的矛盾与暧昧,认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那种总是认为殖民力量是完全为殖民者所拥有,殖民叙述完全由殖民者所叙述的观点在历史和理论上都是过于简单化的。所以不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都有成为“殖民主体”叙述殖民体验、表达本土认知的可能。¹因此,当我们重回1940年代香港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言说时,不仅要看到作为殖民者的英国的叙述,还要看到该时段身处香港的作家们文学创作中的叙述。通过深入1940年代香港文学的具体文本,我们会发现该时段香港文学殖民话语的含混。作家因着不同的主体经验、文化心态、政治立场和殖民体验,在对香港的日常生活描摹、异国人形象建构以及香港人形象建构中均表现出不同的呈现视角、表达方式与历史隐喻。于此同时,作家也会随着殖民情势的变动而在文学创作中做出殖民批判指向的转变。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或相互抵牾,呈现出1940年代香港文学含混杂沓的殖民话语。

参考文献

- Boehmer, E. (1998).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 Boehmer, E. (2005).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9253715.001.0001>
- 陈智德. (2018). *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樊善标. (2019). *域谛听杂音: 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年代)*. 中华书局.
- 侯桂新. (2014). 抗战期间香港的文艺报刊与民族共同体想像.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5), 8-12. <https://doi.org/10.16061/j.cnki.cn46-1076/c.2014.05.003>
- 黄念欣. (2015). *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二*.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黄万华. (2004). 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89-104. <https://doi.org/10.16287/j.cnki.cn11-2589/i.2004.02.004>
- 李应志、罗钢. (2015). *后殖民主义: 人物与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卢玮銮、郑树森. (2017). *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谢晓虹. (2015). *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小说卷一*.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赵稀方. (2003). *小说香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赵稀方. (2019). *报刊香港: 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香港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植苇如、周睿)

¹ 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 人物与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135-136页。